

论翠翠、巧云的女性自主意识

——兼谈沈从文、汪曾祺作品的独特风貌

贺建英

(西昌一中,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而又富有光彩的女性人物形象。而女性自主意识又总是透过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本文试图通过深入探讨这种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找到这种意识与人物命运之间的某种联系,从而探寻到作家在创作中的某种倾向。

【关键词】女性自主意识;生命轨迹;爱情心理历程;审美理想;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30-04

女性最早是以神的形象走进文学殿堂的。

这确乎是一句经典性的断语。但我们在此并无意于颂扬女性作为神的崇高,却关注着女性作为奴隶之后的觉醒。因此,我们不妨将《边城》中的翠翠以及《大淦记事》中的巧云等颤动人心的女性形象作一番论述,以期获得某种启迪和注释。

一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又专注的神情。”^[1]

“翠翠在风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2]

寥寥数语,而两位少女的清朗明丽之态尽出。然翠翠与巧云震撼人心的动人之处并不仅在于此。通观全文,满溢着她们的形貌、性格以及她们的为人所深忧或深幸的命运。如此而已吗?当然不。

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边城》时,希望读者能“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的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居然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于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3]

无疑,这一切,他所塑造的翠翠已经替他做到了。

我们不得不探询:这是为什么?

翠翠和巧云那不露痕迹、自然天成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

我以为,这是因为在沈从文、汪曾祺的笔下,她们具有了一种意识:自主。并且,在这种自主意识的牵引之下,她们表现出的前后相继的期望和勇气。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的。尽管,我们承认翠翠与巧云所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历史局限性,都不可避免地呈现着历史的悲剧,从本质上都必然归属悲剧的命运。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在这悲剧超越以前的途程上,自主——它代表了一种社会意识的进步。这,必然不可磨灭地增添了翠翠与巧云作为女性的光彩。

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只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同样,我们对于翠翠和巧云的观照也不能孤立于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之外。

“《边城》反映的是湘西一个边远的小城茶峒二十世纪初叶的社会人生风貌。这是一个原始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的社会。”^[5]

沈从文所描述的茶峒人过着沉静而自律的生活,“也爱利,也仗义,”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妓女,“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其民风可谓淳厚,颇有些桃源之风。同时,小城凭山依水而筑,有一营戍兵,五百来住户,沿河多筑吊脚楼。城中有小资本家、厘金局等,包括作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的街市内容,这也就是有些时代特色的非桃源之风吧。

翠翠,便是这茶峒城溪边白塔下老渡船工的孙女,生于斯而长于斯,沐染更多的是桃源之风。但随着情节的发展,翠翠与船总二儿子傩送的爱情发生了演变,桃源之风(原始民性)尽去而非桃源之风日

渐峥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愈加鲜明的展现了作为以儒制礼的社会内容一封建宗法关系。这一封建宗法关系在作品中没有具体的替代物,也没有人物化的趋向,但却以“一座碾坊”和“一只渡船”作为两种经济地位的象征,而两种经济地位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说,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中间,横亘出一座碾坊,这可以看作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当然,我们从作品的社会习俗、人事物境的描绘中,不能直接找到这种封建宗法关系,它始终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而存在,这也是作者的深刻之处。就在这块土地上,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错综交织,翠翠的人生世界也便呈现独特而清新的景象。

在这里,“一切总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各人皆在分定的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些都悄然混糅进翠翠的生命里,她“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自然、勤劳、真淳、甜美,她与茶峒的风情是和谐的。其原因在于:她对自己的生活处于不自知的状态。终有一天,端午节赛龙舟的喧哗,将翠翠吸引到了大河边。人散之后,她站在河边的黄昏里,久等祖父而不来,她第一次单独地面对自己,单独地面对陌生的世界,她才起了一个怕人的念头:“假如爷爷死了?”虽然朦如萤火,闪闪烁烁,却使翠翠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那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更使她“沉默了一个夜晚。”而且,后来的两个端午节“不知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节经过的事情甜而美。”与傩送的相遇是强有力的外部条件,她开始了对生命的自觉,也开始了对爱情的倾心的期待。同时,也标志着翠翠作为女性,其自主意识的产生。

我们再以此方法考察《大淖记事》中的巧云。

大淖,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临一片大水,有沙洲,长满茅草和芦荻。男人“讲义气”,不怕事,也决不生事。挑夫们的生活也很简单:卖力气、吃饭。数姑娘媳妇挑鲜货的情景最有特色:“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的走过,好看得很。”此外,这地界中,婚嫁不必明媒正娶,聚散离合皆属自然。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街里的人称之为“风气不好。”大淖,作为封建文化意识覆盖的一个空隙,也颇类一个桃园。巧云在人事的凑巧下,顺理成章地能有机会与小锡匠十一子朋友般相处。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

是象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对巧云来说,生活无意识地流过,仿佛在等待命定的一切。这种不自知和无意识,使她在命运的河流里无助地沉浮:失去了一次牢牢抓住幸福的机会,遭到“破身”的沉重打击。只有当“好象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念头唤起了她的觉醒,她与十一子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这晚的月亮才真切地照出了巧云人格的亮光,这月光也即是巧云自觉、自主意识的象征。

《大淖记事》中,呈现着极丰富的作为背景的社会关系,点染着具有经济差别的地方保安队的号声常日喧紫不绝。因此,作为巧云等善的一方的对立物极为强硬,但是,为月光所照亮的自主意识也很快传给了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以至“他们把平日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巧云的形象由此更加动人。

从翠翠和巧云的社会环境以及她们这种意识产生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沈从文与汪曾祺在审美理想上的某种一致性。都热情地颂赞了少女们的自主意识所映射出的光辉。尽管强弱交错,不能肯定其前景必然直指地平线,但都呈现了作为女性的人格尊严。赋翠翠与巧云以美丽与动人。

三

《边城》对于翠翠的命运,是这样提示的: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人们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着的期待与忧虑都是同样深刻的。

而《大淖记事》对巧云则寄予了乐观的展望:

“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

前文中,翠翠与巧云的自主意识已经为我们所认同,但何以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尾声呢?何以有这样两种相异的生命轨迹呢?

幸而,在作品中,沈从文与汪曾祺精妙的心理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对其生命轨迹探源的机会。

纵观翠翠整个的爱情心理历程,有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初为爱情所唤醒的翠翠,还带着朦胧的、同时也是美好欢悦的心情。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到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害羞,轻轻地说:‘看水鸭子打架!’……自问:‘翠翠,你真的在想什么?’同时自己也在心里回答说:‘我想得很多、很远,可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这是她对爱情的朦胧体验和向往。这种自然的、纯净的爱情心

绪可以说带有极大的梦幻色彩,还没有渗入世俗的、现实的成分,因而它美好、欢悦。却也于不为人知处悄悄埋下了与茶峒这个独特的世界不相和谐的第一个音符。

第二,对爱情的隐忧阶段。

随着这一爱情向往与现实的相交相融,拉开了翠翠对爱情的隐忧的序幕。当她意识到“碾子”是自己的潜在威胁时,“小小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吧?是的,她仿佛当真觉得自己是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生自己气。”这不安、纷纭正是她对爱情前景的本能的预感。隐隐的忧虑、与现实的不和谐更为增强。

第三,爱情与现实的对立、悲剧性的期盼。

作者这样提到《边城》中的人事:“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此素朴的善中难免产生悲剧。”^[6]应该说,“悲剧”的“不凑巧”包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从外部来讲,前文已提到:那座横亘在翠翠与傩送爱情中间的碾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竟然使得向来诚爽的祖父行事变得“弯弯曲曲,不利索,”颇多谨慎,也颇多胆怯。碾坊是悲剧的因子,它沉默而从容,它是同着那块产生了它的土地一样牢固的。作者没有低估它作为经济象征的力量,它微妙地使得一切的人事都“不凑巧”起来,也使得那个温柔美丽的黄昏愈加透出人心薄薄的凄凉。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些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爱情与现实的对立,以及二者浓重的不和谐,不可避免地使翠翠的命运朝着悲剧的结局上走。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悲剧的“不凑巧”的内部基因:翠翠得知来做媒的不是自己所钟情的二老,而祖父又误解为大老时,她委屈极了,“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让人联想到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中的歌词“满腹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其郁悒、忧伤尽溢于中。她心中乱乱的,“想赶去也赶不去。”独自在深翠的竹簧、黄鸟、竹雀的叫声中“感觉着、望着、听着、思索着:‘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进水中去了。”这里,人的神态、意识、语言、心理,都融合到景物之中了。构成强烈的暗示,透露出人物隐蔽的

心理内容。”^[7]其中包含的寂寞、无助、无从表达的郁闷、痛苦、深虑,无不是她自主意识的体现。然而,翠翠对爱情的倾心期待,仅仅是一种期待。女性从自主意识产生到能够自主,中间毕竟还有着许多的艰难,翠翠没有能够走出这段艰难,她所生活的茶峒世界,人们始终在过者“命定”的痛苦、“命定”的人生,这体现于翠翠,始终不能将爱情自主地倾诉,她是将自己的命运的支配权交付给旁人的,因为,总有人在提醒她:“一切有我。”因此,翠翠的期待便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期盼。

巧云呢,汪曾祺通过其行动、语言方面的精到描写来表现其心理,使她完成了从意识的产生到有意识的行动,这一重大的跨越。

作品中,巧云遭到“破身”的不幸时,更为无助、凄凉。“她怔怔地坐在床上……还得上街。”“她想起了新娘子……天边的妈……吮手指上的血。”命运是多么的不公平,它将一个少女的单纯,将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想法,顷刻间轰毁,这时的恨与悔是多么的刻骨铭心。但生活依然在继续,家里还有残废的爹。对这生活,对这不幸,巧云都不得不独自去承受,也不得不自主地去行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翠翠所没有的。因而,巧云的自主意识较之于翠翠有了更为丰富,也更为深层的意义。

巧云以行动进行的抗争,表现为与心上人十一子灵魂与肉体的相依,没有丝毫的迟疑。十一子为她被打得半死,巧云为他灌下救命的尿碱汤,“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尝了一口。”似乎这注入了十一子生命的药汁,也能使自己获得新生,饱含着同生死共患难的深情。她毫不犹豫地将十一子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也表现了一种承负人生艰难的勇气和信心。重要的是,巧云的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体意识染给了大淖的人们,赶走了刘号长。虽然,绅商依旧,戍兵犹在,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悲剧了。读者当然不会忘记,巧云为养活三张嘴,挑担挣“活钱”时,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巷,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的情景,也不会忘记巧云眼里的深沉、坚定。因而,巧云的命运必然展现了较翠翠更为广阔的前景。

四

在对翠翠与巧云的自主意识及命运的质与量的分析的同时,我们不难找到两位作家在艺术表现视点、心绪及内在气势上的相异之处,我们在此着重阐明他们在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独特风貌。

首先,两位作家在作品的艺术表现视点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尽管沈从文与汪曾祺描写叙述的都是那个过往岁月中的故事,表现的都是或具有

原始古朴之风,或具浓郁民俗、异于“子曰”之气的
环境及人事。但是沈从文的艺术表现视点是在现实
中抒写理想王国。汪曾祺却是在现实中进行“忆
往的写实。”

《边城》中,存留着未为时代所浸垢的自然的人
性、物事。作者着力描绘美丽的深翠的山、清碧的
水、淳朴的民风以及“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人性的人生形式”,^[8]“沈从文本质上是理想主
义者。”^[9]他在描写中寄托了一种渴望人性净化、人
间关系和民族品德得到合理的改善的人生理想。
比如小说结尾处写到:“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
塔,又重新修好了。”白塔的重建也就是“民族品德
的重建”的象征。《边城》是一篇具有象征性的抒情
作品。理想要在作品中得以表现,有赖于一种选
择,有意将丑恶的现象舍弃于作品主题之外。因此
这种理想之中蕴涵了创作主体的深沉浓郁的感情
色彩。而汪曾祺的《大淦记事》发表于1981年,对过
往岁月的回忆同样表现着一种选择。但它与《边
城》相比,客观上是具有一种历史的优势。回忆中,
血丝较少,而人世的艰辛、痛苦和混杂其中的温暖、
乐观,却表现得醇厚而精微。翠翠的形象中寄寓了
美好、善良的理想品质,巧云的言行则透露着浪漫
的色调、巧云所生活的环境中,人的观念和行为都
有着更多的自由。比如,“情愿”,是大淦男女相好
的唯一标准。汪曾祺这种历史的优势还表现为,因
时间和距离的映射,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已化为一种
从容不迫的思绪。因而叙述中表现出悠然坦荡,不
疾不徐的风貌。

其次,关于两位作家的心绪。

沈从文谈到《边城》时说:“故事中充满了五月
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来时闷人的热
和闷热中的寂寞。”^[10]这正好是作者内心的情绪的写
照。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描绘必然基于对现实
人生的感触。理想社会表现的越完美,越强烈传达
出内心世界在现实中的惆怅与矛盾。沈从文在谈
到自己对文学、人生的看法时说:“要紧处也许是把
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11]他深刻
地认识到,生命是庄严的,在展现生命之美时,他不
忍心书其被损害;但现实又是严峻的,他又不得不
正视这现实中的生命,因此,翠翠的命运也只能向
着悲剧走,使篇末翠翠那倾心的期待,成为她永远
的碑。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内心的痛
苦和矛盾。

而《大淦记事》为我们描述的有如一个浪漫的
民间故事。作者汪曾祺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经从
逝去的旧时代中挣脱出来,建立在丰富的人生体验
上,开始回头发掘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如果
说,沈从文的抒情小说中蕴含着诗与散文的韵味,
那么汪曾祺的小说更形成为散文文化的小说了。这
本身就标志着作家一种平和而成熟的心境,一种智
者的风度。赋予巧云的便是活泼、乐观、勇敢的性
格特征。于是巧云所追求的自主,必然形成乐观自
信的尾音:

“十一子的伤会好吗?

会。

当然会!”

最后,谈谈两者内在气势的差异。

在对边城世界的描绘中,无论是两岸竹篁的翠
色,还是赛龙舟的溪面的一片烟,抑或是那个“温
柔、美丽、平静”的黄昏,无不浸润着一种忧郁的
美。是“微笑里挟着忧郁。”并且为延伸情感的表
达空间,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透过这些表达形式,
我们寻到的是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真、善、美的追求。
不能将沈从文追求的理想人生理解为陶渊明的“世
外桃源”。应该说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带
有更多的儒家风范。现实的痛苦、丑恶折射和变形
为作品中的忧郁、美丽。正因他生活得真和执着,
所以才感到痛苦。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所表
现的朦胧而深远,美丽而忧伤的意韵了。

同样,汪曾祺的《大淦记事》中也有独特的气
势和风貌。他的语言明快而畅达,情绪坦荡而纯
净。有一股活泼泼的洒脱之气。前文已提到过,汪
曾祺是发掘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之光彩的。巧云时
代的人们勇敢、忠诚、乐观、互助、有信心。无论
遭到痛苦还是不幸,都能豁达乐观地重新开始生
活。这中间既有儒教影响下的重教化的倾向,又有
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部分显示
着儒道协调的审美态度。这不能说是不可可能的,
因为孔子(儒)也带着淡人事尚自然的态度,他就
曾经赞赏学生曾点的人生追求:“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

以上分析表明,翠翠与巧云不同的命运以及
生命轨迹的不同延伸,都绝不是偶然的,并且她们
表现在对生命和命运的自主意识上,呈现出前后相
继的特征。这,即是人类生命的一段轨迹,也即是
一种社会意识的进步。

[2]李燕华,党辉.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文化建设路径探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

[3]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2/26/content_17339049_11.htm,2009-02-26.

[4]龚志伟.反贫困文化: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1.

An Analysis of the Rural Cultural Poverty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UANG Shuai, LI Dan-d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110161)

Abstract: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Cultural pover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poverty is often neglected. New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highlighted the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progress. Education can be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overty claim begins with education,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farmers, and increasing their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ural cultural poverty status and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some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Rural Poverty; Cultural Pover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33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汪曾祺.大淦记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2]沈从文.边城[A].沈从文精选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C].上海:良友出版社,19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5.

[6][10]沈从文.水云[A].沈从文选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8]沈从文.题记[A].沈从文小说习作选集[C].上海:良友出版社,1936.

[9]李瑞山.代表作·前言[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11]沈从文.沈从文代表作[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A Study on Cuicui and Qiaoyun's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Independence

——Including Shencongwen and Wangzengqi's Special Writing Style in Their Articles

HE Jian-ying

(Xichang NO.1 Middle School,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Many living and colorful female figures are produced in numerous literature works. And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independence is alway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th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common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nsciousness, tries to find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igures' destiny and it, then explores the writers' certain tendency in writing.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Independence; Life Track;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in Love; Aesthetical Idealism; Tragedy Destiny (责任编辑:张俊之)